

●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思批判与价值彰显

——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及其价值向度

杨 乐 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杨乐强(1961-),男,湖北黄冈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研究。

[摘 要]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在历史哲学语境条件下形成的一套反思性的批判话语,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革的关系是其话语活动的直接动因,总体性辩证法理论、物化理论和阶级意识理论是这种反思的核心主题,而意识决定历史是其反思的内在理念和逻辑归宿,这一点鲜明地凸现出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价值向度。

[关键词] 总体性;物化;同化;阶级意识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3-0274-05

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3—1971)是匈牙利共产党人,20世纪重要哲学家。他因于1923年发表《历史和阶级意识》而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齐名,被人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由于他在理论上觉察到第二国际后期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在实践上亲身经历了中欧和东欧在1918—1923年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从爆发到失败的整个过程。因此,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实质上是他在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既表现为他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庸俗化倾向的清算,又体现出他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在建构起总体辩证法理论、物化理论、阶级意识理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题的同时,还凸现出他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决定作用进行张扬的价值向度。

卢卡奇进行反思批判的直接动因在于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恢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权威,用批判的武器达到对武器的批判。

由于亲身经历了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复杂演变态势,卢卡奇十分明了各种背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并着重指出有两种极端倾向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同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有效结合:其一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崛起的“青年派”和第二国际后期的考茨基为代表,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宿命论”,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为一种“经济主义”,在实践上奉行客观主义直线性的自发演进过程,否定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其二是以伯恩斯坦和以麦克斯·阿德勒

等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强调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在实践上他们奉行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

卢卡奇正是在理论上洞悉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各种越来越严重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之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卢卡奇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的接受马克思的一些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它科学地坚信,辩证唯物主义是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沿着其奠基人所开创的路线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能得到发展、扩大和加深”^[1](第2页)。作为方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一种改变现实的革命的辩证法,卢卡奇指出,如果“理论本质上是革命过程本身的观念的表达”,那么,构成理论基础的就是“辩证的方法”^[1](第4页);“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改变现实”^[1](第5页),而否定和背离辩证法,或“由于抛弃和玷污了辩证法,历史(就)成了无法认识的了”^[1](第14页)。在这里,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是与他总体性范畴的分析相关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总体性范畴包含如下诸方面的实质内容:

第一,总体性标志着构成整体的诸要素或部分的相互作用过程,它“不是把它的各种因素化为一种无差别的一致性,化为同一性”^[1](第15页),也不是把相互作用理解为简单片面的线性因果关系。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作为总体经济活动的诸因素,它们不是同一的东西,相反,“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体都是这样”^[2](第749—750页)。他指出,由总体性决定的相互作用也不能归结为庸俗唯物主义所理解的那种片面因果关系或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否则,我们“就没有认识社会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可能性”^[1](第16页)。

第二,总体性是对主体和客体的整体设定。在卢卡奇看来,既然总体性是构成整体的诸部分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总体性范畴就能够在决定着认识的客体的同时,决定着认识的主体;并且,“只有假定主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客体的整体才能够被假定,如果主体想要了解自身那它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整体”^[1](第32页)。主体的整体存在同客体的整体存在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是辩证法的必然要求,是辩证法全面性原则的体现。卢卡奇认为,由于辩证法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是“对整个历史过程的认识”^[1](第39页),是对现实的总体把握,而这种认识和把握的前提是依赖于主体及其能动性的,因此,卢卡奇指出:“行动、实践在本质上是对现实的干预和改造……只有在主体自身是总体并具有这种干预能力时,现实作为总体性,才能被理解”^[1](第44页)。

第三,总体性优先于部分的实质是理论的优先性和支配性。诚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特定的现实,形成自由和必然相互关联的具体样式。但是,主体借以改造客体、认识必然、追求自由意志实现的基本条件则是具有优先性和支配性的理论。虽然从理论的基本形成过程看,它是依赖于实践的,但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总体性目的和内在构建过程看,理论始终是作为整体的动力发生机制而突现其优先性和主导性的。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3](第462页)。在卢卡奇看来,只有当意识的出现必然成为历史的过程朝着它自己的目的所必须迈出的决定性的步骤时,理论才能发挥其历史性的功能,使这个步骤成为实际的可能性,成为“随意识而出现的实践的必然前提”^[1](第4页)。当然,理论的优先性和支配性,并不是指理论可以脱离实践,相反,它正是在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基础上通过与实践的相互关联表现其“革命功能的”。

卢卡奇对总体性的这种不同表述和说明,实质上就是要把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看做是一切历史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并突现以特定理论作引导的主体能动性。而这个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清算和批判的过程。卢卡奇指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寻找要么从无产阶级的科学中彻底地取消辩证法,要么对辩证法进行改良的方法,走上了“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歧途”^[1](第14页),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精神旨趣和方法论的背离,在客观上维护了资本主义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

态领域的稳定性,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二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是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那么,资本主义物化趋势及其同化机能则是淹没人们革命意识、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外在现实原因。

所谓物化,卢卡奇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1](第 224 页)。其中,“人际关系具有一种物的特征”^[1](第 93 页),同时,“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1](第 96 页)。这里,卢卡奇使用“物化”概念,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商品现象,特别是商品生产的内在动因、商品的本质结构和商品交换的形式规则及其后果对社会总体生活和人际结构的深刻影响。他把这种影响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方面,“从客观的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 and 事物之间关系世界拔地而起(商品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1](第 96 页),即以商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客体及其物际关系突现在人的面前,支配着生活世界和社会的运作过程,人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个过程。它消解人际内容,淹没人的主体性。

而从主观方面来看,卢卡奇指出:“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人的活动肯定是按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方式去做”^[1](第 96—97 页)。人无力驾驭自己的活动,人做着不由自主的行为,这正是物化在主观方面所造成的人的自主性同人自身活动的分离状态,它表明主体的活动已对象化为外在的力量,与主体自身相对立。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过程是一个以物为中心物役人的过程,也就是物的本质结构、内在机理和运作规则僭越人的主体地位、消解人的思想、颠覆人的价值、侵蚀人的主体性的过程。这种物降人的过程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工人作为生产主体的被物化和被分解,即“工人的人的属性和特征日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既不是在客体上也不是在他同他的工作关系上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结合到机械体系中的一个机械部分”^[1](第 99 页)。

工人的劳动力“对象化为某种跟他总的人格相反的东西”^[1](第 100 页),工人的心理特性被机械化过程“从他的总体人格中分离了出去,并使这种心理特性与其人格相对立”^[1](第 98 页)。工人被“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第 100 页)。

卢卡奇指出,物化过程不仅仅使工人遭受物役性,它同时还是一个以物的外观遮蔽着的社会对人的同化过程,这个过程在生产领域表现出“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1](第 97—98 页)。在心灵领域则同化出统一意识结构,“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1](第 104 页)。

人的外在的物化状况,契入人的心灵,迫使人从意识上认同和接受人的物化,“因而涉足整个社会的统一意识结构”^[1](第 111 页)就应运而生了。资本主义通过物化结构的心灵渗透,侵蚀人的道德领域,通过对道德的支配强化着意识的物化结构。因而,物化对生活的侵蚀是一个从外在存在到内心经验的总体同化过程,它赋予一切人间的东西以商品的特性,最终迫使人不得不以异化的方式禀承商品的特性并作为一种待售出的物参与普遍的市场交换,从而,“整个社会在历史上就第一次服从于或者趋向服从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并且社会的每个成员的命运都由统一的规律所决定的”^[1](第 102 页)。同化体现出资本主义物化的彻底性和深刻性。

资本主义物化对人的主体性的淹没,同人的革命意识的被瓦解,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阻止各种革命行为发生的物质基础。

三

1918—1923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除了前述原因之外,还有阶级意识上的原因,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包裹着全部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因,因而从中能够找到历史事件的生发机制和历史演变的内在机理。

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并自觉影响历史进程的完整的观念系统。他说,阶级意识是“对于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典型的地位作出的恰当和合理的反应。因此,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这个阶级的每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总和,也不是它的平均数”^[1](第57—58页)。这种阶级意识既不同于从心理学上可以描述、可以解释的人们在生活中对他们的处境所形成的观念(个体意识),也不同于“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一种阶级条件的无意识(经济意识)”^[1](第58页)。阶级意识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社会总体的表现,因此总体性应该成为阶级意识的准则。卢卡奇依据这个准则,着重从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完整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性质与作用,并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完整的阶级意识作引导,才能推动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

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物化的同化趋势有其深厚的阶级意识根源,其中居于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核心地位并起统摄作用的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与体现这一原则的科学技术。在卢卡奇看来,正是这两个东西直接代表着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社会成员心灵的控制和人的主体意识的压抑,造成对人们革命意识的扼杀。

所谓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卢卡奇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把一切纳入可计算性和可规范性的貌似客观必然性的生存原则,它以提供生存的精神安全感和对各种物质需求以可满足性而具备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意义。这一原则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中直接启动人们从思想观念上认同物化的是经济合理性,即一种“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1](第98页),这条原则包含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是资本主义谋求合理化的基础。此外,科学技术以其固有的客观中立性和工具操作程序的合理性而直接成为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的运作机制,它强化和扩展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丧失客观中立性走向意识形态的过程,这样,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依靠其意识形态的优势,掩盖了真正的形势,“掩盖了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1](第241页),而这正是合理性原则和科学技术的独有成就。它表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既能在观念层面上成功地扼杀人们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意识,又能在操作层面上有效地遏制社会可能的质变和更新。因此,以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精神支配,是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精神因素。

卢卡奇上述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同时也表明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向度,这就是他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张扬。在卢卡奇看来,作为展示人类解放希望的精神力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对人类生存状况(人的物化、人的非主体性存在等等)的整体意识和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它以其总体能动性、历史首创性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赋予无产阶级以全新的社会责任感,它的基本目的就是在逐渐实现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统一中展现其变革社会的功能,无产阶级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越是紧迫,“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越有力和直接决定它的每一个行动”^[1](第79页),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之所以能够“自觉地帮助决定历史的过程”^[1](第343页),就在于这种意识的理论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在武装共产党组织过程中所具有的总体优先性和对于革命实践的能动反作用,作为真理,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获胜的武器,“这一真理越是无情,它就给无产阶级带来越大的胜利”^[1](第77页),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忽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忽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真理的直接后果。

综上所述,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涉及到从革命的指导思想到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诸方面,体现出他对自己所确立的总体辩证法的贯彻,其主题是明确的,其批判是深刻的,其张扬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价值向度是严肃的。这些对于我们在新世纪继续牢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

批判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物化的危害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等等,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意义。但是,由于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一种方法,把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绝对化,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理论在整体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轨,犯了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复活黑格尔哲学意识创造历史的错误,招致当时共产国际的批判,他不得不在国际大会上做出深刻检讨,承认自己理论错误的实质。然而,对于卢卡奇来说,这种检讨与其说是迫于政治压力,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4](第 2 页),从而一方面,可以在共产国际中保留一席之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至于像柯尔施那样“与共产国际闹翻了”^[4](第 5 页),另一方面,可以以回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灵活地坚持自己的理念。正如他晚年所说:“发展本身发生危机时究竟将选择何种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中产生的回答”^[5](第 548 页)。可以说,张扬意识决定历史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是卢卡奇终其一生的价值追求。这一点如同其他缺憾一样,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加以戒除的。

[参 考 文 献]

- [1] [匈]乔治·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英]盖欧尔格·里希特海姆. 卢卡奇[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5] [匈]乔治·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严 真)

Reflective Critique and Manifestation of Value

—Lukács's theoretical theme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its dimension of value

YANG Le-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G Le-qiang (1961-),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Abstract: Lukács's work-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is a suit of reflective critique discourses form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 The relation between Marxism and epoch change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Lukács's act of discourses. The theories about dialectic of totality, reific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were the kernel themes that Lukács had reflected, and the idea that history is determined by consciousness was his inherence one or his logic end-result, this point showed brightly Lukács's theoretical purport or value dimension of Western Marxism.

Key words: totality; reification; assimil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